

# 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的新认识

白晓<sup>1,2</sup>

(1. 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 210094;2. 北京师范大学社科管理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价值进行了分析。当人类社会进入后危机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及当代价值也日益彰显。文章针对后危机时代的特点,分析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当代彰显。因此,本研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价值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6-0118-05

自马克思主义价值形成以来,不同时代的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人类社会进入后危机时代以来,国内一部分学者,如:李元发表的《“后危机”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趋向与未来》、冯晓宁发表的《后危机时代背景下对全球经济危机的哲学反思》、柯健发表的《后危机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贺方彬发表的《后危机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徐海燕发表的《金融危机背景下对资本论的现实思考》、刘清发表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释疑》等,这些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分析。但是对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的新时代内涵的分析比较少,因此笔者针对后危机时代的主要特点再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对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应对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社会主义国家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2009年下半年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世界逐步迈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简称后危机时代)。立足于后危机时代的现实背景解读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获得一种新的更为宏阔的视野,而且更能透视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凸显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特质和深层意蕴及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 一、后危机时代

2007年8月美国爆发大规模次贷危机,由此引发的全球性金融风暴迅速波及实体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演变为一场全面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全球的经济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2009年下半年,在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全球经济逐步回升,结束了经济危机时经济环境的极度萧条和社会

收稿日期:2011-09-11

作者简介:白晓(1975-),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

心理状态的恐慌而进入了相对平稳的“后危机时代”。但由于危机的根源并没有也不可能得以彻底解决,世界经济仍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而,后危机时代指经济危机已经触底,经济已经处于复苏的时期,是一个缓和与未知的动荡并存的时期,“是一个既包含了危机内容又囊括了危机之后新的时代内容和价值的过渡性阶段,是由危机时代向新时代转变的中间环节”<sup>[1]</sup>。

### (一)后危机时代是“危”与“机”并存的时代

首先,就此次经济危机而言,虽然整体来看,世界经济已经逐步好转,很多国家的经济也实现了季度环比正增长,世界工业生产逐步回升,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贸易重现活跃。但是危机爆发的根源依然存在,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未来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迟缓,具体表现为欧元区、日本增长相对乏力,美国经济失业率居高不下;私人消费和投资疲弱;局部性危机和连锁反应风险、高资产风险依然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0年美国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商业地产贷款到期。2007-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今后1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约9.05万亿美元,而当前美国国债规模已高达12万亿美元。欧盟成员国政府债务问题同样严重。当前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公共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sup>[2]</sup>。可见,后危机时代是一个经济得以回暖与风险并存的时代,是希望与问题同在的时代。其次,后危机时代为各国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它们已经成了全球摆脱危机的关键力量,是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新动力源。这必将有助于削弱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经济基础,推动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受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造成相互之间力量对比不同,再加上后危机时代的风险对各个不同国家的未来影响难以确定,也造成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些必然导致在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更加复杂多变。英国昆廷·皮尔指出:“就当前这一历史时刻而言,其不寻常之处在于,多项根本调整正在同时发生。正是这一点使最终结局如此难以预料。”<sup>[3]</sup>总之,后危机时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特殊历史时期。

### (二)后危机时代是大调整的时代

综观世界历史,每一次大的经济危机都会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的调整与变革,进而引起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大调整。首先,此次经济危机的结束比预期更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在应对此次经济危机中,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各国政府都采取了许多积极有效的措施。而此次经济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也在于政府放任了市场行为,缺少了

对市场的监管。后危机时代的各种矛盾更离不开政府来协调,因而就需要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做出重大的调整。其次,低碳经济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所谓低碳经济是指为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通过技术创新、新能源开发、产业转型等手段减少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区域的清洁发展,促进产品的低碳开发和维持全球的生态平衡,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方面的调整与变革。再次,在后危机时代,各种权力配置与利益格局都将进行重大调整,隐藏的深层次矛盾也开始凸现,社会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将更加多元、多变。正如罗伯特·赖克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即将到来的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每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使命将是应付全球经济的离心力,这种力量正在拆散把公民联系在一起的纽带。”<sup>[4]</sup>

## 二、后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价值的彰显

(一)资本主义不管如何发展,只要基本矛盾未变,其本性、规律就不会改变,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

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逻辑观点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群众的购买力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sup>[5]548</sup>

就此次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而言,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美国的金融监管出现了问题,监管当局没有对金融创新进行有效监管;有人认为是美国的消费模式出现了问题,过渡消费导致了经济泡沫化。但这些并不是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长期存在的生产无限扩大与社会购买能力的需求不足。而之所以存在社会购买能力不足,最根本的还是在于资本主义这种制度所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固有矛盾,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所有者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导致劳动者购买能力不足,相对过剩的危机也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改变它的所有制,因而这一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能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存在意味着劳资双方的对立基础不可能消除,随着社会差距的不断拉大,阶级矛盾、阶级对立不仅不会消除,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激化。可见,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再次为实践所证明。

(二)新古典自由主义不是普世价值,相反它是引发新的世界金融危机的理论根源

“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它对以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政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推崇“万能”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干预,主张非调控化;反对公有制,维护私有化;反对福利国家,主张福利个人化;宣扬自由贸易,鼓吹全球化。为适应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的需要,“新古典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家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由于受“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国家不干预”思想的影响,美国政府解除对金融的管制,导致社会分配关系严重失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理论观点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和理想成分,其遵循市场群体的无序性、自由的不公正性、追求效率的非理性。从这次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可以看出,“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潮是一股强大的“腐蚀性”力量。一直以来的“美国权威”、“美国神话”的轰然坍塌,充分暴露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弊端与危害。市场经济虽然是现代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但也不是万能的,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催化剂。新自由主义完全放任的理论不仅不是什么普世价值,而且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后危机时代就是世界“远离自由市场、信贷宽松、高风险交易和高薪的黄金时代,进入一个以紧缩银根、加强管制、减少投机和政府更多干预市场为特征的新时期”<sup>[6]</sup>。为此,必须加强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倡导国民树立理性消费观。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现了制度与体制的有机统一,制度为体制的有效规范运作提供了基础保障,体制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激发出来。

(三)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是正确的

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就像癌症一样,成为了不治之症,不断地复发和扩散。恩格斯说:“一方面应当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和它在一定历史时期存在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应当揭露这种生产方式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因为以往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事物的进程本身,不如说是针对有害的后果。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sup>[7]</sup><sup>366</sup> 迄今为止,经济危机有古典和现代两种表现形式。二者并无本质不同,都是马克思早已指出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对此赵磊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sup>[8]</sup> 1929年的大危机导致了凯恩斯革命,即政府干预投资和刺激个人消费,实质是推动政府和个人共同消费以化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当

下应对“次贷危机”采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有化等措施与凯恩斯时期采取的措施并没有本质不同。可见,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超前消费都不能根治人民真正的需求不足,在资本统治的制度框架内,任何举措也都不可能根除经济危机。因此,必须从生产关系上进行调整,其他所有解决危机的方法,都可能在将来起到相反的效果。作为癌症的经济危机,总有一天必将造成资本主义肌体的最后衰竭,不治而亡。这一点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必然的论述是十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真理性,再次为世界经济危机的反面实践所证明。

三、后危机时代彰显马克思主义价值的途径

(一)理论创新是彰显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前提条件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sup>[9]</sup><sup>432</sup>。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新的回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只有在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才能彰显其影响力、凝聚力。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了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幅下滑,而中国却因为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受到的损害较轻,而且很快成为全球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引擎,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成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即注重同时发挥市场和宏观调控的作用,注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不同社会矛盾和问题,着眼于在社会实践发展进程中针对现实问题,不断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萌芽于1956年的中共“八大”,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其中就包括计划生产是主体,自由生产是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sup>[10]</sup><sup>398</sup>,这是对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创新。后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的影响,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开始不断形成和完善。邓小平挣脱教条主义的藩篱,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sup>[11]</sup><sup>148</sup>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高度评价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sup>[11] 373</sup>这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志这样一个传统思想的束缚,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创新。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七大更是提出了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健全社会信用体系<sup>[12] 181-182</sup>。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形成和不断创新中,同时强调市场和宏观调控的作用,不仅克服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1980年代深圳等地的飞速发展、1990年代上海的迅猛发展以及21世纪中国经济GDP总量由世界第6到2010年世界第2的飚升,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神奇表现,无不验证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创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价值。

(二)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是彰显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根本保证

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发端点就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维护为其逻辑起点。恩格斯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sup>[13] 446</sup>在谈到理论和群众关系时,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曾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sup>[14] 681</sup>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阐明了科学理论的创造、科学理论的生命力同人民群众的实践、同人民群众命运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产生、发展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因而,在当代中国,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理论归宿,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成果,都是在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基础上,产生于人民群众改造社会、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为此,首先必须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状况。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研究不同群体思想的特殊性,充分考虑广大干部群众的实际理解能力、文化水平及思维方式,需要有较深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是要根据不同群体采取富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其次,全面了解和把握各阶层群众的思想状况和特点,是做好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最后,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独立思考和思想选择。必须明确,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教育,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正如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明确指出:“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sup>[15] 209</sup>因此,后危机时代应在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的基础上,针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宣传工具,开展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普及活动。

(三)大众传媒是彰显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技术载体

20世纪开始的新的信息传播媒介工具的变迁,与人类社会信息文明阶段的到来互为因果。特别当纸质媒介在大众传播媒介中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给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大众媒介以后,不仅是信息传授方式自身发生的改变,更是该媒介所传承的信息所影响和作用的社会文化结构和面貌的改变。原先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而在中国社会中被置放在“云端”并被权威化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因电子传媒对原先由信息不对称所造就的社会等级等权威的祛魅,减弱其在大众中的影响。同时因政治生活对中国人当代生存影响程度的重要性呈大幅度减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的、社会的理念而与普通人的生活亲和不足,造成其难以被当下受众自然地认同和接受。事实上,电子媒介真切地削弱了大众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敬畏、尊崇,电子媒介也分散和削弱了原先可能由政治力量垄断而单独对大众施加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来传统的手段——借助社会政治实践施行全民控制和影响,以实现和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显然并不适应当下的传播语境和受众发展了的接受状态与接受心理。在电子媒介已然形成新的大众接受心理、行为状态和习惯中,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传播

需要在大众可以接受的对等站位中,放下身姿、换一种形象,找到与大众生存现实有关联的新的关节点与接续点,并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风格与形式进行信息的传递。这要求后危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以平民化的姿态、平民化的作风,用平民化的语言,讲平民化的道理,务实平等地与人民群众交流对话,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结合熟悉的生动案例,用电视、网络 and 多媒体等多种宣传方式,建设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络宣传阵地,增强网上理论宣传的吸引力、战斗力。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借助电子媒介的特性,最终实现更好的传播。

总之,经济危机的爆发、应对及后危机时代的来临,再次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在后危机时代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始终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借助于最新的传播媒介,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自身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内在要求,更是时代变化和现实新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

#### 参考文献:

[1] 贺方彬. 后危机时代语境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1): 27-31.

- [2] 梁建军, 韩建萍. 后危机时代社会发展的几个新变化[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0(6): 177-180.
- [3] 昆廷·皮尔. 一个宏大的秩序走入视野[N]. 金融时报, 2009-04-06.
- [4] 罗伯特·赖克. 国家的作用[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1.
-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 [6] 拉娜·福鲁哈尔. 全球资本主义新时代现在开始[N]. 新闻周刊, 2008-10-13.
- [7]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8] 张宏良. 南开大学讲座[R]//熊冰雪. 世界金融危机演化和影响, 2008-11-13.
- [9]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
- [1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2] 编写组.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13]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5]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On the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the Marxism in the Era of Post-crisis

BAI Xiao<sup>1,2</sup>

(1.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P. R. China;  
2. Management Center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P. R. China)

**Abstract:** Post-crisis era is a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and is intended to ease the crisis and instability, but it is also the era of big adjustment, grea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The coming of Post-crisis era proves value quality and truth quality of Marxism. For demonstrating Marxist value and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and era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We should stand 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he same destiny with the masses, using technical carrier of mass media.

**Key words:** post - crisis era; Marxism; value

(责任编辑 彭建国)